

印尼邦夏(PEMANGKAT) 话趣谈(上)



多年前，友人托来雅加达《赤道之光基金会》欢度新年的录相片，几个邦夏的同学观赏，看到有个小品用我们讲的话表演，并谓之是“邦夏话”，令我等有点飘飘然，甚有荣誉感。

后来和山口洋老乡讲起，他们争辩说应叫“山口洋话”，因为山口洋比邦夏大、人比邦夏多。为生长地争光情有可原。为叙述方便，这里权且称之为邦夏话吧。

西加缘何流传“河婆腔”的邦夏话

熟知西加里曼丹的人都知道，那里是印尼华人聚居最多的地方之一，坤甸及其周边地区讲潮州话、梅县话为主，往北过了喃吧哇从百富院起(SUNGAI DURI)经山口洋、邦夏、三发、斯古拉，东北向的孟加影、华峇，甚至东马来西亚砂劳越的古晋，不管原籍是潮州人、闽南人、兴化人、广府人、海南人，通用语是有别于梅县话、以前又称嘉应州话的客家话。

这里的“有别”主要是语音(腔调)不同，词语也有相异，类似普通话和山东腔的普通话，彼此基本能听懂、沟通。

50年代，笔者到椰城升学，与山邦同学以邦夏话交谈，问椰城同学开玩笑，问道：“你们讲的是哪一国的‘英语’？”的确，它还有别于印尼腔很重的邦加、勿里洞的客话呢！

由于工作关系，有缘到过“客家祖地”福建宁化县石壁村(今建有“客家祠”、博物馆。据考证历代客家先祖从中原南迁，经此落脚繁衍，再往各地迁徙的客家人有150多个姓氏)也到过闽西客家县诸如长汀、永定等地，试图找到邦夏话的“根”。

宁化的方言，很仔细听大概只能听懂一半，到了长汀(客家母亲河汀江发祥地)讲的则像梅县话，毗邻的江西赣州人讲的亦然。可再往东南到了永定(胡文虎的家乡)，讲的又和梅县话不尽相同。

在椰城、新加

坡、柔佛等地与讲客家话诸君交谈起来，甚感与邦夏话更接近。

据听过邻近河婆的丰顺、兴宁、甚至惠东、深圳宝安、九龙上水等地老乡讲的方言，也类似邦夏话，印尼纬维君在多篇散文中称之为“河婆腔客话”，笔者认为切近。至于西加为何会形成这独特的河婆腔的邦夏话，有待行家考证。

掺杂印尼话的独特方言

80年代，陪同马来西亚回来的姑母、表妹第一次到祖籍地河婆(原属揭阳，今是揭西县府所在地)探亲。我和表妹都生长在海外，听“正统”的河婆话招呼吃饭讲成“食PON”，称妇女为“PU-NJIONG”(辅娘)很是不顺耳；同样，我们不期然地用习惯问话：“你有几只阿纳”(孩子)某某“西拉拉”(同宗)住在哪里？家乡人亦懵然，戏称我们讲的是“番薯话”，其实这是马来话ANAK、SAUDARA取其音演化过来的。

邦夏话最大的特点莫过于掺杂了许多马来话(即现在的印尼话)听邦夏“老本地”讲的客家话甚是有礼趣，例如骂顽童没有礼貌、缺少教养，“果朗阿热”(KORANG AJAR)警察局叫“干突”(KANTOR)，更早期叫“痾八寮”，两人相好叫“佳

湾”(KAWAN)市场这个词早忘了而叫“巴杀”(PASAR)咖啡店干脆说“哥比店”。类似例子真是不胜枚举。和友人根据回忆数过，仅是我们所知就超过200个词字。

所谓“老本地”是指至少在两百年前移居当地的华裔。史籍记载，梅县人罗芳伯到西加是1772年，也就是说在这之前已有一些许多粤东闽南人定居在此，披荆斩棘开发当地。

问起这些人的祖籍地只知是广东人或福建人，准确些的说是“海陆人”，到底是海丰人还是陆丰人？那就说不清了。二、三十年代从中国南来落脚的“新客”、不管哪一乡籍、甚至梅县人，日久也渐渐随俗使用这特有的邦夏话。

半个多世纪前听过一个故事，话说有3个老华侨“落叶归根”，相约回到唐山后不再讲“番话”。3人一路同行，临近家乡时看到有茅草屋，甲惊叫道，啊！唐山也有“亚答(ATAP)”屋乙幸灾乐祸叫道，你“沙拉(错SALAH)”了！丙说，你们都要“

胡公”(HUKUM处罚)这故事说明，中印语言交融已是难分难解的地步。

恢复华教乃当务之急

二战后至60年代中期，是当地华文教育最昌盛时期，同时，学习印尼文的重要性亦为华人日渐重视。1966年苏哈托上台不久华校被封、华文报刊被禁，印尼话渗透入邦夏话加速。

笔者于92年第一次回到印尼与年青一辈亲友拉家常，问他们做什么“头路”(从事哪一行业或做什么生意)一答做“广北斯”，另一说，拿他的“果米斯”，弄得我这个离开邦夏32年的人听不懂他们讲的到底是什么“斯”！经七转八拐解说才明白前者是做制衣业(KOMPEKSI)，后者是当经纪人拿佣金(KOMISI)我说，非请某同学来当翻译不可，他们说，我会“呼翁”佢(HUBUNG联络)，又令我如遇丈二和尚！这也难怪，他们被剥夺受华文教育的权利，不懂华文也就不知华文相应的词语。

